

## “俄罗斯心灵中最美好的本能”

——论旧与新<sup>1</sup>

祖春明 译 (A.C.霍米雅科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北京 100037)

**提 要:** A.C.霍米雅科夫是俄国斯拉夫派的领袖与核心。19世纪中期,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围绕着俄国历史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论旧与新》(1839)既是斯拉夫派形成的标志, 也是俄罗斯历史哲学方面的重要文献。它在观点、内容和风格上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从观点上来讲, 这篇文章代表了斯拉夫派在历史道路问题上的主要立场和观点: 寻找并复活古罗斯生活中的美好原则, 坚持自主性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从内容上来讲, 它以独特的方式描述了俄罗斯历史并对其进行了深刻阐释。但这种阐释的目的是为了未来俄国的历史道路。从风格上来讲, 它代表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思想家的基本写作风格: 哲学政论。它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哲学论文, 而更具有政论色彩。俄罗斯哲学肇端于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肇端于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历史争论。这篇论战之初发表的奠基之作对于我们了解俄罗斯历史哲学, 乃至整个俄罗斯哲学都将大有裨益。

**关键词:** 历史哲学; 俄罗斯; 历史道路; 斯拉夫派

**中图分类号:** B512

**文献标识码:** A

据说, 过往俄国土地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乡村中教育得以普及, 城市中秩序得以维护, 法庭上正义得以伸张, 生活中需求得以满足。在祖国的大地上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俄国的各种力量都获得了发展, 无论是道德和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俄国保留和强化了两个原则: 一是政权要同人民和睦相处, 一是纯洁而文明的教堂要拥有自己的自由。这两个原则都是为世界其他国家所不熟悉的。

人们真的都会识字吗? 但在我这里保存着的俄国贵族效忠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统治者的文件副本, 在那本该签名的地方, 我们的特洛耶库罗夫公爵、大贵族拉吉谢维兄弟和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贵族们却代之以十字架, 并附有说明: 我们不识字。城市中真的秩序井然吗? 但我所熟识的许多老人还清晰地记得, 西伯利亚人因反抗政府征收实物税而进行了怎样的斗争; 这种斗争就是发生在西方的因征兵引发的斗争, 而且, 这种斗争在最早被征服的城市中引发了接连不断的冲突, 那些贵族的随从、亲属和税吏常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倾巢而出, 随时准备战死或负伤。法庭上真的能伸张正义吗? 但波扎尔斯基公爵曾因受贿被告上法庭却被宣布无罪, 古老的谚语却证实先前的判决是不公正的; 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和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所颁布的命令和新规章重演了包庇统治者自身受贿行为的一幕; 而当民众受审时, 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现象却很普遍。人们真的会对自己这样的生活感到满足吗! 每当粮食生产出现哪怕是一点欠收的时候, 人们就会大批大批地被活活饿死, 或是被迫逃亡到波兰, 或是卖身给鞑靼入侵者, 抑或是出卖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给克里木人或自己的

俄罗斯“兄弟”当奴隶，而这些克里木人和俄罗斯人不见得就能比鞑靼人好到哪里去。政权真的是与人民和睦相处吗？且不说偏远地区，即使在梁赞，在卡卢加，甚至是莫斯科，人们的暴动和近卫军的哗变也是常有的事，沙皇政权经常会因为那些心怀不满与政府作对的军士暴乱感到痛心疾首，甚至会被迫对无耻的宫廷阴谋做出让步。为数不多的几个政治寡头操纵时局和俄国的命运，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扩大或剥夺不同阶层的权利。教堂真的是文明和自由的吗？只要世俗政权希望干涉推选牧首的事务，那么，牧首的任命就得听命于世俗政权的意愿。普斯科夫的一位高级僧侣因杀死和溺死了数十个普斯科夫人被告发，但他获得的刑罚仅是被关入修道院中，而斯摩棱斯克的一位主教却仅因为住处奢华而受到重罚，他被罚清扫主教的院子和刷洗他的马匹；“百项决议”教会会议<sup>2</sup>迄今仍是教会粗鲁、愚蠢和渎神的永恒见证，而反僧侣敲诈的法律又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教会神职人员最低级和有害的品质。那么，古老的黄金时代到底有什么呢？一想到这个问题我便不禁忧愁起来。我们是否应该在罗曼诺夫王朝之前寻找美好和善良呢？那里等待着我们的伊万雷帝凶残的肖像和他年轻时荒唐叛逆的故事，是瓦西里荒淫无道的统治，是顿斯基子孙的丧心病狂，然后就是蒙古金帐帝国的统治，贵族割据土地，彼此内讧不断，欺压凌辱百姓，将俄国出卖给鞑靼这样的蛮族，当时的俄国满目苍夷、血流成河。那时的俄国没有任何美好和高尚的东西可言，也没有任何值得尊重和赞美的东西可言。取而代之的是一直以来的蒙昧无知，法庭上的有失公正，以及随处可见的械斗、阴谋、徇私枉法、剥削压迫、贫困潦倒、怨声载道、野蛮粗鲁和无耻卑鄙。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一个人民幸福生活的时刻，没有一个令人欣慰的历史阶段，但当目光转到当代俄国时，我们不由得为祖国所呈现出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欢欣鼓舞。

很好！但如何解释雅季科夫发现的农村会议记录和斯特洛耶夫找到的文件呢？这些可不是仿造和臆想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分类学家的猜测；这是确凿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农民确实曾经识文断字和组织严明：这种严明的组织以召开农民大会和进行全民决议的形式保留了下来，而且无论是当地的乡绅势力还是来自上层的死刑威胁都没能摧毁它。如何解释那些确凿的证据呢？它们证实了城市井然有序，市民各司其职，下层可晋身高层。如何解释无疑在北俄和中俄出现的陪审制，或口头的公共法庭？它们不仅曾遍布各处，而且因“口头法庭”<sup>3</sup>的名称而保留了下来，虽然这种法庭在形式上来说是非常好的，但却并不是完整的机构。那又如何解释那些咏唱农民生活的民歌呢？现在的俄国农民可想不出这样的民歌。如何解释当时还没有农奴制度呢，要知道它可是无耻剥夺一切人权的制度啊！如何解释当时的社会平等啊？所有阶层几乎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人们可以从事所有级别的国家事务并由此获得至高的荣誉和尊重。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甚至是古代俄国最凶残的敌人都应该承认我们在这方面优越于西方民族。俄国的领土扩张和抵御外敌为我们提供了政权存在的确凿证据，我们曾经战胜过多少和多么强悍的敌人啊！而政权与人民的友谊印刻在人们的古老习俗中，各个阶层会推举出一些代表来共同商议国家事务。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保留到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时期。最后，纯洁和文明的教会自由体现在一大批圣徒身上，他们有力的话语比君王的智慧和狡猾更大地促进了帝国的建立，还体现在人们对上层神职人员所表现出来的尊重上，而且不仅俄国人尊重他们，就连外邦人也尊重他们，还体现在主教和都主教们丰富的图书馆藏上，宗教书籍上，神学讨论上，约翰的书信上，特别体现在我们教会对罗马教会的反击上。

通过以上这些叙述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古罗斯呢？有关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史料中记载的那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给予它们以同样的辩护，也给予它们以同样的反驳，没有哪一个体系，也没有哪一个古代的艺术重现符合这些史料并使它们的全面思想得以充分的揭示。

当下我们亟待解决如何看待古罗斯的问题，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对它置若罔闻了，这是因为当代如此清晰地表明它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未来的走向完全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观

念。如果在过往俄罗斯的生活中没有任何美好和有价值的东西存在过，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从其他民族的生活中，从理论本身，从最文明的民族所取得的成果中，从现代人的追求中获取一切。我们可以果断地开始做事，将异乡的果实嫁接到家乡的果树上，翻种土地却并不撒下一粒种子，当收成不好的时候，内心的良知也会感到不安，而每当此时我们总是安慰自己说，还是这样做吧，否则会比以前更糟糕。如果相反，俄罗斯的古老时代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其中蕴藏着所有的真理和善，那么我们劳作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而一切也将变得容易多了。你看，这些是档案，这些是古代文件、交易、法庭仲裁和编年史的札记等。我们仅仅需要引入事实对这些档案汇编作一些批判就可以复活古代的王国、机构和法律了，而它们原本是在被人遗忘的柜子和抽屉中慢慢腐烂的。

在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简单的考察之后，我们还是很难同意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是复杂的，因此，解决它也是困难的。究竟哪一个俄罗斯更好，是旧的还是新的？是否有许多外来元素已经进入到现在的俄罗斯有机体中？俄罗斯是否接受这些元素？俄罗斯是否丢掉了许多自己的基本原则，它们又是些什么，我们是否应该为失去它们而感到惋惜并努力恢复它们？

现在的俄罗斯我们可以亲眼看见：它既令我们欣喜，也令我们烦闷；我们可以骄傲地同外国人谈论它，但有时甚至对自己人都羞于开口，但对古罗斯，只有猜测。核对所有这些史料的结果，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将会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就是过去和现在一样，在法律和生活之间，在法定的机构和灵活的民间习俗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和谐的地方。那个时候的法律，现在的也一样，或是比习俗要好，或是比习俗要坏，而且很少获得实施，要么是被废除了，要么是在补充条款中被更改了。如果我们相信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理解俄国习俗的所有变迁。我们将会懂得，表面上的各种关系是那么轻易地改变着，我们同时也将明白，这种改变并不会触及人与国家机构之间，国家、市民与教会之间关系的实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选取新时代最高尚的法律之一作为事例，它让我们可以在古人面前炫耀，与之相反，我们也列举一个古老的决议，它则让我们在想起它的时候带着悲伤。当严刑拷打在俄罗斯被取缔的时候，它正在欧洲的法庭上肆虐，当时的法国和德国毫不掩饰地谈论它，并且把拷问看作是侦察案件和惩办凶犯所必须使用的手段。即使这样，我们是否就能说，在俄国从来没有过严刑拷打呢？实际上在俄国同样存在着严刑拷打，它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审讯中，在所有的法庭上它都是那样地惹人注目，就在不久前首都一个几千人的会议上，当着那些达官显贵的面，也当着君主自己的面，一个愉快的声音在那里大叫：“你不是想尝一尝辣椒水的味道吧？”农民的奴隶地位是由彼得大帝造成的；但当我们想到农奴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他们甚至不敢擅自逃离，而要想获得许可就必须通过法庭，然而法庭在遥远的莫斯科，掌握在地主手中，农民的对手总是比他们富有，在国家等级中也总是比他们高贵，想到这些，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尽管这种奴役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承认，但是农民的奴隶地位是存在于风俗中的吗，难道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废除《农奴法令》<sup>4</sup>不可能引起动荡和暴动吗，难道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彼得大帝仅仅是撤消了一个多余的、甚至已被人遗忘的机构就应该被视为是他的英明之举吗？事实与规定的制度就是这样自相矛盾的。当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无痛心地想到，法律同意为奴役的无耻行径背负责任，尽管这种奴役是由风俗所引发的；我们也想到法律神化和巩固了特权阶级的肆意妄为，但这种状况由来已久；我们还想到它表面上看来是限制了教会的自由；但我们同样想到，贵族阶层的权利在日益削弱，范围却在不断扩大，它几乎为所有愿意加入贵族阶层的人敞开了大门，这使贵族自己感到负累重重以致于准备退出贵族阶层，而在专制土地上的教会所受的限制更多的是来源于政府对教会的冷漠，而不是来源于某个政要，虽然这个政要对于几乎完全听命于宫廷的教会牧首而言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罗曼诺夫王朝之前的俄罗斯一直处于混乱之中，这使得我们无法将它与今日的俄罗斯相比较，因此，我一直在谈论那个俄罗斯，那个彼得遇到的俄罗斯，那个作为过往自然发展结果的俄罗斯。我知道，在那个俄罗斯中保存着许多美好

的本能，但它们每时每刻都遭受着人们的恣意曲解；我也知道，终将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粗暴地践踏公正、自由和教会纯洁的神圣真理而受到惩罚；但不得不承认，在人们的生活中所有最美好的原则不但没有获得发展，反而完全湮灭于人们的生活中，这在法律触碰到他们虚假的生活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随着俄罗斯帝国的逐渐形成和日趋巩固，最早的那些纯粹的和宗法的社会组成的痕迹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城市失去了往日的特权和千人兵团的保护，往日喧嚣的市民大会沉寂了下来，确立了门阀制度，形成了贵族阶层，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而美好的道德只留存在那僵死的形式中，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内容。国家不可能同时在各个方面上发展。当国家自身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它在无限扩张时突然记起了自己以前的起源，便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在这个时候它就会对所有局部的和微小的个人利益视而不见，忽略那些多少有些过时的习俗和法规而不再坚持它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出那已经成为无益礼俗的美好本质，国家朝向一个目标前行，它为自己确立了一个任务，并且集中了自己全部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凝聚分裂的各个部分，巩固政府联系，完善整个社会构成，应该说是机械地完善它。

约翰三世限制了北方各城的自主权，同时确立了门阀制度的程序，从而使所有封地都掌握在莫斯科大贵族的手中；伊凡四世炮制出了削藩制；费多尔二世在莫斯科建立了大牧首制，戈杜诺夫加强了农奴制，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按照西方的方式来装备军队，费多尔废除了门阀制度，因为它不仅无益于政权，还有害于俄国，这最终成为了他们功勋的终点；一个有铁一般的意志，非凡的智慧，但只面向一个方向的人，关于他我们看不到过多的赞扬，也看不到过多的指责，但是后代在回忆起他的时候只是心怀感激，这个人就是彼得大帝。我不会评价他的所作所为，我只想顺便提一下，他不应该被看作是俄国贵族制的始作俑者，因为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和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已经无条件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做领地了，这已经为大贵族的出现开启了合法的肇始；也不应该在压制教会问题上指责他，因为教会的独立自主早已经丧失了，在牧首的宝座在公国内部进行承袭时就已经丧失了，大牧首在皇城内可以是自由的，但在莫斯科他已经不再自由了。

如果我们将俄罗斯 19 世纪的状态与它 17 世纪的状态进行一个比较，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家变得强大了，并且能够反思和不经内部斗争而逐步改善；一些美好的原则，它们曾经被抛弃和遗忘，现在又被法律神化并且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如取缔死刑，刑法中对人格的尊重，以及社会下层有可能晋升到较高国家等级，从而享受更好的条件，更高的声誉和权威。最后，法律使一些由习俗带到人们生活中的滥用合法化，并且，很显然，这使得它们更加深入人心。我很清楚，法律的道德纯洁性对于一个社会是何等重要；我也清楚，在这种纯洁性中隐藏着国家的全部力量，未来生活的全部原则，但我仍然认为，有时候那些为法律所保护的不当习俗，正是因为自己的厚颜无耻才最终被纠正，否则，这种坏习俗的无声和隐秘的鼠疫几乎就是不可治愈的。那么，我们时代无耻的合法奴隶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负担，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道德上都是如此，应该采取全面和可靠的措施根除它。同时，彼得大帝改革前农民的奴隶状态可能成为永远的创伤并在较小程度上导致农民沦落到无产者和失去土地的英国工人的境地。我所能看到的非我原则实在太少：彼得三世时期产生的贵族阶层已经在人民精神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它非但没有欧洲贵族的派头，甚至比彼得改革之后更纯粹，彼得的改革加强了贵族阶层，巩固了领地的绝对继承权。

启蒙运动试图摆脱丑陋的形式主义、近乎仇视的对人类的漠视和某种理智和精神麻木。这种麻木类似于犹太人的自大和多神教的漠然。与此同时，在启蒙的生活和进程中还表现出了过多的世界主义、某种新教思想、对信仰的有益原则及基督教精神完善的背离。

我已经说过很多被我们丢弃的美好的自发传统：但似乎我也表明了在法律触碰它们之

前，它们已被风俗所损坏。它们首先是被民众杀死，然后才被统治者们所掩埋。我们可不可以说：“你们安息吧？”不可以，我们最好说：我们对它们永志不忘，而且将永远记住它们。法国《民法典》的主要制定者康巴塞雷斯曾这样说过：“过时的东西是法律最公正和最苦涩的批判。”

他说的是正确的，但又不完全正确。当国家持续几个世纪处于戒备状态时，很多法律可能被完全忘记；但这种不自觉的遗忘并不是意味着开罪于法律。尽管有因权宜引发的坏习俗，有人民的无知和政权的专横，法律变得暂时无力了，失去了效应，但它隐秘地活在我们的心灵中。

俄罗斯心灵中最为美好的本能，这些为基督教所形成和培育起来的高尚的心灵本能，连同这些隐藏于我们心中的不为人知的古老记忆带来了我们值得骄傲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取缔死刑，自土耳其的中心地带解救希腊和希腊教会<sup>5</sup>，开辟了选拔国家官员的法律途径，以功绩或知识水平为选拔前提，和平的政治策略，宣告基督的律法和真理为唯一律法，人们的生活和相互关系都应该建基于此。似乎完成了一些什么；但尚有更多的东西有待于完成，自古代保留下来的那些回忆、传说或象征中蕴藏着一种精神，它呼唤我们做无可比拟的更多的事情。毕竟这个美好的世界正在消亡，或几乎死于俄罗斯连年不断的内部和外部争斗之中。如果俄罗斯国家没有恢复，一切就都消失了；但国家存活了下来，巩固了，并变得异常牢固；现在所有以前的原则都能够并且应该因其自身永恒的力量而获得发展和传播。我们不必为赶不上西方而感到羞愧。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过去没有一丁点美好的东西。越往前看，他们就越感到社会更糟糕、更没有道德可言。我们的古代为我们提供了个人生活中、诉讼程序中和人际关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榜样和原则；但所有这一切都因缺乏国家原则、内部纷争和外敌奴役而遭到了压制和破坏。西方人不得不逃离过去的一切，如同远离愚蠢的东西，并且在自身中重新建立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们只要复活和明确已有的东西，使它重归于意识和生活就足够了。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出俄罗斯历史中所有的最初原则。瓦兰人的政权是国家的外部层面；公国中的市民大会是内部层面。整个俄罗斯的统治权、国防和外交都掌控在一个领导雇佣卫队的瓦兰-俄罗斯人家族手中；真理的法庭维护着习俗，解决由公民大会提出的各种内部统治问题。在俄罗斯的任何地方结构都大致相同，但完全相同的习俗却无处可寻，不仅在相隔较远的城市之间，甚至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这样在地缘上、利益上和居民成分构成上都很相近的城市之间都没能实现。那么，内部联系究竟在哪里呢？一些斯拉夫部落的偶然联合，虽然他们之间互相并不了解，也从未在同一个国家的统治下生活过，但他们结合为某种联邦，这种联邦以非民间出身的大公间的亲缘为基础，或者是部分出于共同的商业利益：未来俄罗斯的自发力量是多么渺小啊！

支撑国家大厦的另一个可能基础是共同的信仰和教会生活。但那个向我们派遣神父并与我们拥有同样信仰、同样教义和同样礼仪的希腊对我们而言不也完全是陌生的吗？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影响力和创造力，俄罗斯大地可能就不会崛起；但我们不能就此说，是基督教造就了俄罗斯。当然，一切真理，所有关于善、生命和爱的原则都保存在教会里，但这个教会是可能的教会、神圣的教会和超越了尘世原则的教会。今天和历史上的一切教会都不是这样的教会。西方教会因同世俗和多神教相纠缠，长期以来都是昏聩黑暗和功利教条的。后来它同东方割裂，为了认识自身而倒向了理性主义，这样它不仅失去了纯洁性，反而在自身中形成了导致未来衰落的有害因素。但它控制了愚蠢的人类并发展了他们的物质和理智力量，从而创造出了美好诱人的世界——天主教和新教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注定是要灭亡的。东方教会的命运与此不同。它同令人迷惑的个人偏见进行了长期斗争。由于理智受到自大的古希腊哲学和埃及或波斯神秘主义的鼓动，东方教会很长时间都不能让它服从于信仰的权威。东方教会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阐明了概念，征服了骄傲的理智，让真理以特定的形式大白于世。

但天意没有让希腊在那个时候就收获自己劳动和英勇斗争的成果。当时的希腊社会已经建基在另外一个牢固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由有益和符合逻辑的法律所决定，并因过往的伟大荣耀，众多的艺术奇迹和诗歌的奢华成就而变得崇高。但所有这一切——历史、法律、荣耀、艺术和诗歌都背离了基督教精神的纯粹性和它爱的真理。国民不能割断同自己历史的联系，社会也不能改写自己的法律，因此，基督教活在希腊，但希腊并不活在基督教中。长久以来，古希腊帝国都是在信仰的活的源泉那里获得力量，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它使帝国得以抵御那些外来敌人，那些来自北方的野蛮民族，南方的战争狂热分子和中亚的野蛮部落；它使这个衰老躯体得以长期同他们的侵略行径作斗争。但帝国却不能重建和加强基督教教义作为它新生活的原则，因为根深蒂固的古代形式使它不能接受基督教教义的完整性。思想厌倦了同社会和国家的外在风俗做徒劳无益的斗争，从而转向了荒漠，转向了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古庙，转向了位于小亚细亚和埃拉多斯的高山修道院。那些美好和特选的心灵把人们内在生活的美带到了这里，他们远离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们所不愿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这个世界也不能让他们臣服，他们挑选了一个新的可以直观内心、进行思考、祈祷和感受精神愉悦的场所。所有美好和高尚的东西，所有那些现代社会所不能实现的东西都生活在他们之中。从此希腊的竖琴沉默了，歌曲的源泉也枯竭了。诗歌转入到修道院中来，进入到僧侣生活本身中来，或者说，成为了这些苦修者的实质。但是由于人类本性注定总是要或多或少地会臣服于，或者至少尊重诗歌精神的纯粹性，因此，希腊世界带着无限的崇敬不断地同那些抛弃了它的人们交往。伴随着对那些伟大导师和苦修功绩的奠基者所表现出来的崇敬，在东方出现了无数的模仿者和假僧侣，就像在我们的时代，西方出现了许多假诗人一样。整个希腊社会都表现出人们之间的相互疏离；自私自利和追求个人利益成为了希腊人的显著特征。国民已然忘记了祖国，只为了私利和虚荣而活；基督徒已然忘掉了整个人类，只寻求个人的救赎；国家已然失去了自己的神圣性，不再具有任何道德价值；教会已然丧失了任何行动能力，仅保存了教义僵死的纯洁，从而不再意识到自己活生生的力量和崇高理想。它依然怜悯人类，安抚他，让他从世俗中获得解脱；但是它已经不记得自己要为整个人类建造大厦的使命。这就是上帝情愿把生命和真理的种子转移到我们北方来时的希腊和它的基督教状态。拜占庭的神父未能在俄罗斯发展出任何国民生活的原则，这种生活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闻所未闻的。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希腊最初是迫不得已才喜爱修道院的，它就是这样带着自己的偏见和自己对禁欲主义的热爱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因此，它鼓励人们忏悔和自我完善，容忍社会，但却不祝福它，在国家存在的地方指责它，但也不会在没有国家的地方建立它。不过这正是希腊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所在。借助它学说的纯洁性净化了风尚，调和了不同部族的习俗，把整个罗斯统一在一个精神整体之中，并且帮助我们迎来了民族生活中一个新的、更好的时代。

所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在留里克王朝保护下的南北方民族联盟并没有形成牢固而统一的整体。各个公国过着各自不同的生活。基辅并不能与诺夫哥罗德同仇敌忾，它也不会倾力捍卫诺夫哥罗德。民众不要求统一，也不愿意统一。国家的外在形式没有同民众血肉相连，也没有渗入到它神秘的内心生活中来。大公间的争斗分裂和损害了俄罗斯，但无论对获胜者还是战败者，各个公国都表现出同样的漠然。但如果哪个沽名钓誉和贪婪的诺夫哥罗德大公妄想争斗中趁机扩大自己的政权和聚集民众的力量（无论他行为的动机如何，是为了共同的福祉还是个人利益），起来反对他的不仅包括那些贪图权利的其他公国大公，还有更珍视自由的村社和公国，它们已经习惯了独立，尽管它们始终备受压迫。但一个是真理，另一个只是事实。

诺夫哥罗德是骄纵、傲慢和自私的，它自顾沉浸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民族原则主导着它的政治生活，因此它从未想过要统一整个俄罗斯。基辅虽然偶然继承了瓦兰人好战的性格，但它的力量还不足以实现伟大国家的理想。因此，直至蒙古入侵时，没有哪一个人、哪一座城市可以起来反抗并且宣告：“我代表俄罗斯，我是它的中心，我聚集着它的生命和力量”。

自东方飘来的乌云是可怕的，它打败了亚洲所有王朝，它是足以摧毁整个欧洲的，如果不是无垠的疆土拯救了欧洲的话。未来的俄罗斯同它在卡爾卡河<sup>6</sup>附近遭遇，但是战败者无须因自己的失败而感到羞耻。上帝似乎在召唤我们统一和联合起来。但是教会沉默着，也没有预言灾难的来临；民众依然冷漠，大公们依旧忙于内讧。因此，惩罚是公正的，重生是必要的。当人的内在活动停滞时，暴力就是拯救。当蒙古人第二次入侵俄罗斯时，俄罗斯的陷落就不那么光彩了。它在面对毁灭时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反抗，也没有进行任何反击的尝试。当你读到这段历史时，你会感到，某种深深的萎靡扩散到整个俄罗斯社会那紊乱的组成之中，你会感受到，这种组成已经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了，你还会感受到，蒙古人的出现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幸运的偶然：因为这些野蛮的侵略者只是摧毁了现存的一切，他们至少不想也不能创造什么。

正当蒙古汗王摧毁了东俄和南俄的所有区域，它的西部也自愿或被迫承认了这个立陶宛野蛮部落统治的时候，俄罗斯的北方完全没有任何关于国家的伟大理念，依旧盲目地继续着自己固有和本土的生活，依旧做着贸易和强盗勾当，新的俄罗斯就在这时出现了。那些来自顿河和第聂伯河的逃亡者，还有那些被从沃伦和库尔斯克等富裕地区驱逐出来的人们，逃进了覆盖在奥卡和特维尔茨河两岸、伏尔加河上游以及瓦尔代高地的森林中来。老城已经人满为患，开始形成新的村落，建成新的城市。南北方开始融合，相互渗透，在莫斯科的空地和荒野上开始了新生活，这种生活不再是部落和族群的生活，而是全俄共同的生活。

莫斯科是一座崭新的城市，它没有历史，也没有任何固定的特征，它融合了不同的斯拉夫民族——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它既是大公们的杰作，也是民众的女儿，这样，它就把国家的外在和内在紧密结合起来，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外在的形式对它而言已经不是偶然的，而是活的、固有的，因此，它与其他公国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也就是毋庸置疑的了。正因为如此，这座新城（无论是按照编年史所记载的俄罗斯古老传统，还是按照城市间的等级排序，作为新城的莫斯科都应该表现得顺从和安静）的大公很早就冒然表现出了强烈的虚荣心，也正因为如此，民众才能够与大公们同心同德。

我并不准备叙述莫斯科公国的历史；从以往的资料那里我们很容易弄懂它所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胜利。它一表达出想要统一俄罗斯的意愿，这个意愿就注定要实现，因为这个念头突然之间就同时出现在大公、平民和以大牧首为首的僧侣之中了。诺夫哥罗德是不能固执己见的，因为城市理想理应让位于国家理想；其他大公很长时间都不能起来反抗，因为他们在自己公国中的统治不是顺其自然的；那些为蒙古人所破坏和摧毁的地区和城市，虽然它们企图自治并且善妒，但并不能成为统一的障碍，因为民众在接受了血的教训以后，本能上趋向于统一，同时，那些对待莫斯科如同对待俄罗斯东正教教主的僧侣已经教会人们服从莫斯科良好意志的智慧。

这就是胜利的原因。那么，胜利的结果是怎样的呢？俄罗斯领土在扩张，物质力量在增长，地方权力在消解，村社习俗受到压制，国家意志逐渐集中在君主身上，这些就是彼得以前的是与非。彼得大帝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俄罗斯开始向西方靠拢，但在此之前，它对西方一无所知。俄罗斯从莫斯科推进到边界上，推进到海岸边，就是为了让重商和文明的异国影响变得更为容易。但这个行动本身并非是公众的意愿；彼得堡曾经是也将是唯一一个行政城市，而且可能的是，国家中心的这种分裂对于俄罗斯正常和合理的发展不曾也将不会是没有影响的。国家政权的生活和公众的精神生活甚至在它们曾经汇合的地方也发生了分离。彼得堡的政治生活由俄罗斯的全部可见力量推动着，由它的所有表面上的改变推动着，由所有它的外在行为推动着；而另一种生活则在悄然培育着未来时代、思想和情感的特征，这种特征注定依然包裹在形象中，并且会由本能转变为完全的、理性的和外显的行为。这样，国家的物质个性表现为断然和明确的行为，完全摆脱了内在波动的影响，而与此同时，民众心灵中那波澜不惊的平静的意识，在保留着自己永恒真理的同时，在越来越远离所有即时利益

和干巴巴的实践外在性的有害影响。

我们看到，俄罗斯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是由共同防卫的链条连接起来的各个独立公国组成的联邦。城邦的利己主义并没有因为瓦兰军队及其军事首领的出现而发生丝毫改变。我们通常把这些军事首领称为大公，而并不清楚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语言的统一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这点埃拉多斯古国已经教会了我们。信仰的统一也不能团结人们，因为它来自于这样一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信仰自己离开了，感到了重建的乏力。当蒙古的威胁和本性爱慕权利的莫斯科公国的建立打破了部落间藩篱的时候，当罗斯重新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局部生活消失了，人们也已经摆脱了封地和公国动荡和局限的生活，但他们仍旧不能把热爱的温暖感觉移注到这个刚刚形成的整体上来。那种感觉是在他们奔向故乡城邦的旗帜下，高声叫喊着“为了诺夫哥罗德和圣索菲亚而战”或“为了弗拉基米尔和圣母而战”时所体会到的。还不曾有谁爱过作为俄罗斯自身的俄罗斯，因为即使人们知道国家的必要性，但还没有人理解它的神圣性。由此可见，即使在1612年，这个我们历史上值得夸耀一番的时刻，与其说是爱国主义，毋宁如说是想要拥有自由信仰的愿望在战争中起了作用，而全俄罗斯的功绩仅限于战胜了一小撮波兰人。

与此同时，当所有古老的习俗以及各个城邦和社会阶层的权利和自由成为确立国家躯体的牺牲品的时候，当原本被物质政权保护起来的人们不再相安无事地生活，而可以说，开始密切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社会道德败坏的溃疡就会蔓延开来，所有人类最坏的欲望也会滋生出来：法官们利欲熏心，成为了人们的笑柄；贵族们爱慕虚荣，请求贵族特权；僧侣们贪恋权利，忙于争夺牧首宝座。此时彼得横空出世，凭借他那高尚心灵的某种奇特本能，一眼便看尽了祖国的所有病症，洞悉了“国家”这个语词所有美好而神圣的意义，他像可怕但有益的暴风雨一样席卷了整个俄罗斯。它横扫了那些利欲熏心的法官阶层，横扫了那些整天想着自己血统而忘记祖国的贵族们，横扫了那些躲在修道室里寻求心灵救赎和满城收税而忘记了教会、人类和基督兄弟情谊的僧侣们。难道历史会为他们中的哪一个求情吗？

太多的错误让这位俄罗斯改革者的荣耀变得暗淡起来，但唤醒俄罗斯的力量和让它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仍归功于他。但他的手段是粗暴和实在的：不要忘记，精神力量属于人民和教会，而不属于政府；政府只是采取某种强制手段来唤醒或泯灭精神力量的活力，区别只是强制手段的严厉程度不同而已。一想到这点就令人沮丧：这样一个如此生动而深刻洞悉了国家含义的人，这样一个完全把自己的个性和他所有臣民的个性奴役在国家之下的人却始终没有意识到，只有在有爱的地方才有力量，而只有在个性自由的地方才有爱。

或许我对古代的责难过于苛刻；但当它自己也责难自己的时候，我这样做难道还有错吗？如果此前的习俗和教会没有形成某种鲜明的形象，使得古老的俄罗斯在其中得以实现，难道我们就不应承认这些习俗和教会中缺少某种甚至多种自发因素吗？但事实正是如此。在自身之外寻找自我持存力量的社会已然处于病态之中。任何一种联合都包含着对共同原则的无声反抗。偶然结成的联邦不断印证的是人们之间的疏远和冷漠，尽管在这种冷漠中还没有敌意，但也没有互爱。人类为宗教所教化，但这个过程很漫长。信仰需要经过很多世纪才能渗透到公共意识中来，进入到人们生活中来，融入到人们的血与肉中来。俄罗斯在接受基督教之时，它的愚蠢妨碍了它深入理解这个神圣学说的丰富底蕴，而它的导师们又已经耗尽了感受基督教本初之美的能力。因此，当大公间的内讧破坏了俄罗斯大地的时候，人们依然跟随着他们；而当神甫们在努力规劝个人不要犯罪之时，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还有一种社会性犯罪。

尽管如此，与西方相比我们还是有无数的优点的。在我们最初的历史中没有侵略他人的斑斑劣迹。鲜血和仇恨并不是俄罗斯国家的基础，祖辈也不用锱铢必报的格言来教诲后辈。教会限制自己的行动范围，从来不曾损害自己内部生活的纯洁性，也从来不曾向子孙们鼓吹自



已违背法律和使用暴力的经验。鞑靼统治前纯粹的公国建制<sup>7</sup>并不与人类的真理相悖，而正义和互爱的法则是这种习俗的基础，虽然它几乎是宗法制的。现在，当创建国家的时代已然终结之时，当大众已然结成外敌无法摧毁的整体之时，对我们而言，懂得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自己道德目标的时刻到来了，因为只有在社会中每个人的力量才属于所有的人，所有人的力量也属于每个人。这样，我们在吸收西方偶然发现的同时，却能赋予它们以更深刻的意义，或是在其中揭示出那些不为西方所知的人类原则；我们向教会的历史和它的法则发问，它们是可以指明未来发展的北斗星；我们要复活俄罗斯生活的古老形式，因为它们建基于家庭纽带的神圣性和我们民族尚未被破坏的独特性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勇敢而正确地向前迈进。那时，古罗斯将会复活，在开明而协调的范围内，在本真的之美中复活。这个社会把公国习俗的宗法制同国家的深刻内涵融合起来，而国家也将以道德和基督的面貌出现。这时的古罗斯已经有了自我意识，而不再是偶然的罗斯，它充满了活生生的本真力量，永远不会在生与死之间摇摆不定了。

#### 附注

1 该译文所依照的原文出自：Хомяков А.С. Всемирная Задача России,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8:204-222. 该译文为全译。之前贾泽林先生曾译此文，并结成题为《俄罗斯思想》的文集。但贾先生为选译，并在一些地方与本译文有所不同。

2 沙皇伊万雷帝于 1551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教会会议——译者。

3 口头法庭很可能是指所有的审理程序都采用口头形式。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口头法庭”成为了完整的机构——译者。

4 废除《农奴法令》是指 1704 年彼得大帝颁布的一道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在俄国撤销了“农奴法庭”，这些法庭曾经专门处理农奴的诉讼——译者。

5 解放希腊和希腊教会是指发生在 17—19 世纪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为争夺高加索、巴尔干、黑海、克里米亚等地而进行的一系列战争——译者。

6 1223 年，俄罗斯人在卡爾卡河畔第一次同蒙古人交战——译者。

7 在鞑靼入侵前，俄罗斯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小公国，所以此处的 област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应该翻译为公国建制，而不是州建制。

## The Best Instincts in Russia's Soul

——On *The Old and The New*

ZU Chun-ming

(CASS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Khomiakov had been the leader and soul of the Slavophiles. In mid-19<sup>th</sup>-century, there had been a fierce debate between the Slavophiles and Westerners. They argued about the Russian historical path. *The Old and the New* (1939),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Russia, is the mark of the Slavophiles' formation. Its view, content and style are highly valued. In terms of its view, this article expresses the main point and view of the Slavophiles: to search and revive the *kind* principles in ancient Russian life, and to insist on the independent path of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its content, it

describes Russian history in a unique way, and gives a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But this interpretation is designed for Russia's future path. And about the style, it represents the writing style of almost all the Russian thinkers in that time: philosophical comment. In strict sense, it is not a philosophical article but a comment. Since Russian Philosophy began with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began with the debate between the Slavophiles and Westerners, this article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Russia, even the whole Russian Philosophy better.

**Keywords:** Philosophy of History; Russia; Historical Path; Slavophiles

**作者简介:** 祖春明（1980—），辽宁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哲学。

**收稿日期:** 2012-02-24

**[责任编辑: 刘 银]**